

用小说法，而以记史

□杨早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评《聊斋志异》是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，意思是蒲松龄是用唐传奇的写法，来叙述六朝志怪的题材。同书评唐传奇云：“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。”倘以“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”八字来评《聊斋志异》，确实也很贴切。纪晓岚看不惯蒲松龄的地方，怕也在这里：蒲松龄把子虚乌有的事写得太细密、太逼真，不可能是从乡野村老那里听来的故事转述，里面灌注了作者自己无限的想象力。

莫言说他继承了蒲松龄的传统，论者多集中于研究两人同致力于民间故事的挖掘，而忽略了“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”的一脉相承。其实再溯源头，就该是“无韵之离骚”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写鸿门宴，写荆轲刺秦，三翻四叠，动人心魄，实开唐传奇之先河。王小波重写唐人故事，从《甘泽谣》《无双传》《虬髯客传》抓取情节人物，更是将古今熔于一炉。

前面的帽子很大，罗列名家，好像他们跟《说史记》有什么关联。其实没有。我只是想说，有时“故事”(story)和小说(novel)的区别，或许就在于细节之多寡、进程之平曲、想象力之有无。

曾自况《野史记》是“用新闻法，以写掌故”，古今笔记掌



《说史记: 小说一样的历史》
杨早 著
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故，多是千篇一律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，像纪晓岚这种自命严谨的作者，恨不得每则笔记都道明出处，会不自觉地使用限制视角，也就会留下供读者想象的空白。这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好处。而我有意识地改用一些新闻的写法，因为新闻可以选择从不同在场者的视角进入一个故事，也可以用口述实录的形式，这就让掌故的写法丰富起来。

到了《说史记》，我就在想：要不要有意识地再往前跨一步？掌故还是短小，适合一个截面或片段，有时不得不不用“快进”的方式，也很难有细节的描写。如果写得再长一些，耐下心来慢慢进入人物与故事，或许

能获得更多元的表达、更现场的感觉。

可是这样一来，难度何止倍增。因为这些故事本已经过了史书的锤炼与浓缩，仿佛一片新鲜的牛羊肉，已经风干日晒成可卷可藏、费牙费劲的肉纸，再要将它泡在水里，想复原成能炒能炸的肉片、肉丁，且不说能做到多高的还原度，水从何来？无非就是各种史料的拼合剔取，再就是作者的“历史想象力”了。

历史需不需要想象力？人言人殊。常常需要给别人讲一个道理：史料不是历史，对史料的阐述才是历史。一堆断烂朝报，要连缀拼接成一段看似完整的历史，想象力必然要参与其间。人们常说追寻历史真相，其实得到的只是某种对历史的解释，当然有高下精粗之别，但“真实”只是，用章太炎的话说，“古人之虚言”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历史与小说，同属叙事，它们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跨越的藩篱。《史记》就是兼二者之美——这也是纪传体的特色，要写活人物，就不可能不运用文学的手法。即使是编年体，一字之择，片语之炼，写者的倾向自然就在其中，也就引导着读者看向他心中的历史图景。

读者可以只看文章好坏，管你历史还是小说。作者心中，不能没有原则。蝙蝠似禽似兽，但生物学上总会给它个定性。

如果你来问我，我会说，我写的是历史，只不过“用小说法，而以记史”。

《说史记》诸篇的叙事者大都是伪托的，但不等于书里的细节是编造的，可是我也不敢说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严格的推敲。我给自己定的原则大抵是：不编情节，对话和场景可以想象，但事件与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述。《觉醒年代》的编剧说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，我写的历史，跟这部剧还是不太一样，小事我也拘，但是现场的氛围，确实只能依靠想象。

其实要分清叙事者是否伪托，非常容易，如果实有其人，他会有实在的姓名与身份，否则叙事者只是一个功能性符号，代表着一种视角，亲历者、旁观者、听闻者……我想追寻的并非清晰的历史阐述，而恰恰是混沌难言的历史现场感，每个人都像瞎子摸象，只了解一部分事实——即使我们这些后世的人，又何尝知晓全部信息？所以这些篇什的目标，就是将近代史这个庞然大物放在一具单筒望远镜里观察，求其细不求其宏。

出于这个目的，我选择的叙事者，往往是一些小人物，门房、丫鬟、学徒、闲人……最好用的，还是躲在幕后的记者。为了追寻鲜活的历史场景，我不惮于在想象中化身穿越者，用这种另类的方式贴近历史，再贴近一点。

齐国之暮歌

□辛希孟

夏龙河的长篇小说“大秦谋局”第二部《齐之暮歌》是一部描写战国末期齐国朝野生活状态的长篇小说。作者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，探幽索微，对历史中一些模糊不清的事件进行了多方求证和梳理，在作品中生动还原呈现的历史细节，让人击节赞叹。

小说还描写了终生不肯为官的齐国名士鲁仲连、死不旋踵的墨家弟子，他们在战国末期四处奔波拼杀，虽然最后无法阻止齐国的灭亡，却荡气回肠，展现了一曲末日悲歌，让人警醒，掩卷长叹。

齐国是秦统一六国之战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，因此齐国的灭亡不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，更是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战，同时也标志着一个百家争鸣时代的终结。



《齐之暮歌》
夏龙河 著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齐桓公时期，由国库出资，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官办学校——稷下学宫。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，无论其学术派别、思想观点以及国别、年龄、身份，皆可济济一堂，高谈阔论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，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“上大夫”，并“受上大夫之禄”，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，允许他们“不治而论议”“不任职而论国事”。因此，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。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、诘难、吸收，使得齐国成为真正体现战国“百家争鸣”的典型。

但是，在以军功立国的战国末期，齐国却在君王后的把持下，自废武功，不修兵戈，并一手废除了与诸国合纵抗秦的生存策略，最终被秦所灭。齐国纳入秦的版图，秦将齐国原属地改名为齐郡。自此，传世八百多年，曾经是战国时最富裕、最强大的国家，拥有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的齐国烟消云散，走下了历史的舞台。

《齐之暮歌》在引用所能查到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，进行合理的想象，又糅合了当地的一些传说故事，最大程度地还原这段风起云涌又诡谲险恶的历史故事。

故事中的其他人物譬如齐国名士鲁仲连、墨家巨子、宰相周子等主要人物，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。苦劝齐王田建不可降秦的即墨大夫，在历史上也有记载，本书将即墨大夫的故事进行了合理的延伸。齐东地曾经有个猗养泽，猗养泽水面浩瀚，但是因为注入的河流太多，雨季经常闹水灾，传说有个“齐大夫”，带领当地百姓，开山凿河，将猗养泽的水引入大海，解决了困扰当地百姓数千年的水患问题，这段劈山开凿出来的河，被命名为“齐大夫河”，山上还曾经有齐大夫庙。“齐大夫”开山凿河的故事在莱阳人人皆知，但是这个“齐大夫”究竟是何人，一直没有确切的说法，作者经过查阅资料推测，这个“齐大夫”极有可能就是刚正不阿的即墨大夫。齐国时期，莱阳之地隶属即墨郡，开山凿河，只能是即墨大夫所为。

当然，《齐之暮歌》不光有国王大臣、将军名士，还有普通的老百姓。田齐代姜后，齐康公被放逐到一处海岛上，他的后人以吕为姓，在当地繁衍生息。在书中，作者虚构了齐康公的吕姓后人，参与到援鲁抗楚和抗击秦国侵略的战争中。这些人的远祖姜子牙是大齐的缔造者，他们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与侵略者浴血奋战，有着不同寻常的思辨意义。

烙在书信上的宋代士大夫

□禾刀

在前不久热映的电影《满江红》最后，岳飞那首气势磅礴的《满江红》写满一堵墙，给观众造成巨大的冲击力。现在想来，编剧的这一灵感不知是否源自宋代画家文同：为了增强记忆，文同把需要考试的内容都刻在一堵墙壁上。若干年后，文同回乡省亲，自己被那堵密密麻麻刻满考试内容的墙壁给震撼了，感觉自己当年做的是泯灭人性的行为。

类似的宋代士大夫“趣闻”，《千面宋人：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》中还有很多。谈到创作初衷，本书作者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仇春霞坦言，主要是此前参与编写《书论备要(古代)》一书时积累了很不错的“边角料”。仇春霞这里所谓的“边角料”，自然是相对主流历史叙事而言，当然这些“边角料”绝非道听途说。仇春霞选择了一个巧妙的切入口即书帖。本书撷取的书帖包括范仲淹《边事帖》、黄庭坚《雪寒帖》、米芾《武帝书帖》、徐铉《私诚帖》、韩琦《旬日帖》、司马光《天圣帖》、蔡襄《安道帖》、赵构《付岳飞书》、欧阳修《端明帖》……共60余位名士120余幅书帖真迹。

本书收集的书帖主题多样，涉及边关征战、官场联络、学业交流、人情往来，以及面对生老病死遭际等多个侧面。见



《千面宋人: 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》
仇春霞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信如晤，书信本身是心灵的一扇窗口，折射的是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历史现状，从中可以洞悉他们的心理活动、人生姿态以及生活的闲情逸致。

由于苏轼在文学上的巨大造诣，在传统叙事中，后人多“情及其身”，对苏轼本人尤其是其官场曲折经历抱有极大的同情。这也意味着，后人很容易相信苏轼的判断，即认为苏轼的遭遇多因章惇的打击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作为改革派的章惇天然位于包括苏轼在内的守旧派的对立面，因“政见不同”，二者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。仇春霞认为，“章惇的很多‘罪状’禁不住考证，但就这么写进史书里去了，而且细究起

来，对章惇的指责中多有苏氏兄弟的影子。”

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故事早就深入人心，以其为蓝本的经典戏曲更是演唱多年，宋真宗朝的刘娥皇后因此背上千古骂名。然而，历史的真相让人惊掉下巴：刘皇后确实没有儿子，宋仁宗赵祯也确实并非她所生，其母是她的婢女李氏。在刘皇后的精心设计下，“李氏为真宗生下一个儿子。刘娥把李氏的儿子当自己的儿子养，并将他扶植为皇位继承人，即仁宗皇帝赵祯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刘皇后抢了李氏的儿子之后，并没有将李氏置于死地，而是将她留在身边，并善待她的娘家人”。相较于北魏因“子贵母死”旧制而闹得满朝血雨腥风，刘皇后此举已算“仁至义尽”。

本书中，仇春霞写到了西夏战争、庆历新政、朋党之争、乌台诗案，也写到了王安石、欧阳修、苏轼等名人的仕途浮沉。虽然官场明争暗斗，但为避免落入众所周知的俗套，本书更侧重士人风骨的书写。

那是一个名士风流的时代。虽然经历了水洛城事件，但范仲淹与韩琦这对改革死对头私下“仍是好友，公私分明，这就是当时的君子吧”。有人对所谓的祸避之不及，有人则因为坚持主见宁愿“飞蛾扑火”，为的就是“气节”二字，这里当然说的是尹洙。当范仲淹被宰相吕夷简以“朋党”之名贬往外

地时，“时年35岁的尹洙不顾自己的仕途，公开申明自己就是范仲淹的‘朋党’，并且主动要求贬官”。忌讳“朋党”的宋仁宗顺水推舟，很快遂了他的愿望。

正如序言中所说的那样，仇春霞在本书中梳理了很多历史的“边角料”，比如蔡襄研制的小龙团茶，以及他最喜欢以惠山泉当作煮茶用水，所以朋友“有机会的话也会把惠山泉水当礼物寄给他”。蔡襄待朋友也不薄，为让在北方的友人杜衍尝到南方的荔枝，他甚至给杜衍寄去了一包荔枝，虽然大多烂掉，但礼“烂”仁义也重。宋代士人的饮食也会让今天的吃货们望而却步。今天有句话“拼死吃河豚”，而在宋代把河豚作为食材很普遍，苏轼就非常喜欢吃河豚。也有人因吃河豚不慎而命丧黄泉，比如曾给苏轼送过几只螃蟹的丁公默。古人的生活条件有限，即便是官员也难免一些疾病的困扰，比如今天几乎不值一提的脚气病，过去曾影响士大夫们的远行，乃至危及性命……

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泱泱大河，那么这本书汇聚的许多“边角料”更像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涓涓细流。许多“边角料”因过于琐碎和寻常，平时难以入主流历史叙事的“法眼”，但“边角料”本身就是历史人物丰满形象的真实写照，也是厚重历史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石。